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纵横谈

□ 杜涛

按“两个客观规律”办事 念好城市乡村“融”字诀

□ 彭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如何写好城乡融合发展这篇文章?可以从把握“两个客观规律”中寻找答案。

“两个客观规律”揭示了历史演进中的城乡互动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城乡关系”“城乡对立”“城乡融合”等概念。

在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他们认为城乡分离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城乡对立则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城乡融合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城乡关系上演进的必然结果。

根据诺瑟姆曲线规律,城镇化率在30%到50%属于

加速时期,50%到70%属于城镇化减速时期。近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增速呈放缓态势,2021—2024年城镇化率由64.72%增至67%,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做出“两个转向”的趋势判断,即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鄂州市长泽镇岷山村调研时强调,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还有四五亿人在农村,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

中的故园。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应是削弱农业、剥夺农民、凋敝农村的过程,而应当是加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的过程。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城乡融合程度越来越深。城镇化不仅是一个与工业化和信息化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过程,更是一个与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对乡村全面振兴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二者有机结合的程度越来越深。

从“离土离乡式”的城镇化到“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一直单向流向城市,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振兴就是一句空话”。

城市是工业、资本、技术、市场的空间载体;乡村是农业、土地、粮食、生态的空间载体。时代发展到今天,传统的“农业—工业”二元经济理论已不能完全解释传统农业部门在完成为工业生产提供积累的历史使命之后的角色定位,库兹涅茨“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轨迹也不再具有普遍适用性。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是一种范式转换,我们就行走在这样的进程中。根据相关测算,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万亿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有研究显示,预计到2035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将缩小至1.8,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倍差将缩小至1.5。但要注意的是,不能单纯追求城市的无限扩张,必须以“五个转变”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着力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和

平等交换,构建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城乡发展共同体,推动形成新型城乡关系。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工农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以工带农”或“以工补农”,而是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型工农关系,不仅是经济结构调整,其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构建工业与农业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经济关系,将农业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让农民分享改革红利,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矛盾。

在2022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受制于人均资源不足、底子薄、历史欠账较多等原因,“三农”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比,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业的25.3%;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明显不足;国内粮食等农产品价格普遍超过国际市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

于城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1,消费支出比为1.9:1。

这些年,情况在逐步改变。从持续推进产生的变化来看,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可以大大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应以现代化的经济理念,将农业纳入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部门分工向产业链分工转变,分散发展向集聚发展转变、分散投入向集中投入转变,推动“离土离乡式”城镇化向“离土不离乡”城镇化转变,推动自发的市场活动向自觉的市场机制转变。

城乡比重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城乡长期共存的格局,是我们把握的基本国情。这两大规律不是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只讲第一个规律,容易出现弃农、轻乡等问题,只讲第二个规律,容易背离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两大规律的最终目标高度一致,都是为了实现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们要把握的异性和统一性,也是我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看清的“罗盘”。

抓住县城和县域两个关键场域

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着要素流动壁垒、产业协同不足、公共服务不均、体制机制制约等现实困境。我们要按规律办事,抓住县城和县域两个关键场域,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

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县城成为大部分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养老的首选。此外,由于县域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县城集中,很多农民为了子女教育也倾向于在县城购房和就业。与大中城市相比,在县城范围内打破城乡分割格局,率先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成本更低、更具可行性。因此,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重要载体是县城,基本单元是县域,基础支撑是产业,主要对象是农民。县城是连接城乡的重要枢纽,要把壮大县域与优化城镇体系结合起来,通过全域规划的建设理念,推动形成“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乡镇—村”的城乡连续体,一体化布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以县城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当前农业的很多领域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化服务模式。新型职业农民白天在田间,晚上一般会住在乡镇或者县城。很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供应、产后初加工、包装、寄递物流等领域的从业人员,晚上也居住在乡镇或者县

城。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县城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战场,也是拉动内需的主要场域。应从县域范围考虑乡村产业的发展,产业链、产业基础设施需要在县域统筹,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破除城乡要素流动障碍。首先,破除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妥善处理“三类人群”面临的问题:针对留在农村的居民,完善其培育和发展机制;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坚持自愿、分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完善其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针对“两栖人群”,保持足够历史耐心,允许其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取消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消除“玻璃门”现象,将户口概念转变为居民概念,使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次,破除土地制度的障碍。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守三条底线,即保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不突破耕地红线、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害。针对三类土地进行改革,承包地应保持稳定,适当调整。依托县—乡—村之间地理位置邻近优势,以及本地投资的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县域经济特别是县域工业与非农业的发展,依循有序改善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民财产性增收。最后,破除城乡间“数字鸿沟”的障碍。目前,城乡之间的主要差距已从基础设施差距转向数字素养和技能差距。应有效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提高信息化供给与村民数

字素养的匹配度。

促进城乡产业、居民生活、生态治理融合。县城作为全县人民生活服务的中心,乡镇作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节点,两者共同构成了县域经济的基础。因此,将县、乡、村视为一个整体,进行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布局至关重要。首先,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以县城为核心构建不同类型产业功能组团,在布局上形成功能组团、产业集群、基地成片、辐射成圈;鼓励特色农业种养、农产品加工、旅游休闲服务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生成,纵深挖潜农业多维价值功能,实现从业者增收,并由此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补齐农村消费短板。其次,推动居民生活融合。不断提高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人居环境的舒适度,有效促进居民生活融合。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加强农村教育资源投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推动生态治理融合。大力推进城乡生态环境的共建共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绿色产业发展、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监管、公众参与机制,构建绿色发展的美丽城乡。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分中心研究员)

理想信念是三大精神之“魂”

□ 唐兴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伟大的精神,总能跨越时空界限,在民族的血脉中奔涌不息,在时代的浪潮中熠熠生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历经百余年风雨坎坷,铸就了无数感天动地、催人奋进的精神丰碑,凝结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其中,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抗疫精神,正是孕育于荆楚大地的三座巍然矗立、交相辉映的时代标识,更是党和人民在不同时代考卷的铿锵应答。透视三大精神的本质特征,可以清晰触摸到理想信念这条贯通始终、生生不息的生命线。

星火征途,理想信念夯实了大别山精神的信仰之基。大别山这片红色热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武装斗争的风雨历程,孕育了大别山精神。而坚守理想信念,正是这一精神的逻辑起点与价值中枢。土地革命时期,大别山区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在敌我力量悬殊、白色恐怖笼罩、斗争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是什么支撑着红军将士和根据地人民不畏牺牲、前赴后继?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强信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绝对忠诚。理想信念之星火,照亮了革命的前程。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部队在这里成长和浴血奋战,即便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革命火种依然顽强燃烧、绵延不断。大别山英雄儿女秉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将赤诚之心转化为“只要跟党走,一

定能胜利”的政治忠诚,熔铸为“山崩地裂不动摇”的钢铁意志。大别山军民在血雨腥风中坚守阵地,在艰难困苦中改天换地,用生命热血书写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矗立起一座永不褪色的理想信念丰碑。

力挽狂澜,理想信念汇聚了抗洪精神的磅礴之力。当洪水肆虐,家园危在旦夕,以荆楚儿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铸就了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伟大抗洪精神。与洪魔较量,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关乎人民安危、国家安澜的特殊战争。从1998年特大洪水到近年来各地多发的洪涝灾害,每一次危急关头,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家卫国作为重大政治使命。广大党员干部将抗洪抢险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现实考场,挺身而出、冲锋在前,立下“誓与大堤共存亡”的生死令牌。人民解放军闻令而动、向险而行,以血肉之躯筑起不可摧毁的钢铁长城。人民群众舍小家、为大家,在惊涛骇浪中凝聚起众志成城的力量,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战胜洪峰、守护家园的壮丽篇章。抗洪精神,正是理想信念在自然灾害考验面前,转化为强大组织动员力、社会凝聚力与科学抗灾战斗力的生动实践。

负重逆行,理想信念照见了抗疫精神的为民之心。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极限大考。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伟大抗疫精神。这一精神闪烁着新时代的光芒,而其最深厚的根基与最坚实的支撑,依然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施,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生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与为民情怀。从白衣为

甲、逆行出征、日夜坚守的医护人员,到刻苦攻关、争分夺秒、探寻良方的科研工作者,从昼夜值守、筑牢防线、坚守一线的基层工作者,到自觉配合、守望相助、无私奉献的广大群众,每一份坚守和付出,都饱含着对党和国家抗决决策部署的坚决拥护,彰显了举国同心、众志成城、显著制度优势。医护人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请战书,党员干部“我是党员我先上”的示范岗,志愿者们义无反顾奔赴的无畏身影,无不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将理想信念在生死考验面前淬炼升华、极致绽放。在抗疫斗争中,我们始终坚持尊重科学、精准施策,秉持命运与共、携手抗疫,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世界观的指导,也是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守望,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自觉践行。

从大别山的烽火岁月,到抗洪抢险的滚滚洪流,再到疫情防控攻坚战,纵使历史场景不断更迭、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贯穿其中的理想信念却始终坚若磐石、历久弥坚。三大精神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共同印证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与精神之“钙”,是中国人民面对艰险挑战时坚韧不拔、不胜不休的思想根基与力量支撑,是镌刻在荆楚大地、激励人民敢为人先的精神基因与制胜密码。正是这种深植血脉、源于真理、成于奋斗的强大理想信念,支撑湖北人民跨越一道道艰难险阻,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深厚持久、延绵不息的内生动能。我们要持续从三大精神中感悟信仰力量、锤炼政治品格,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让三大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作者系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今年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顺应新时期我国消费转型升级的大趋势,回应人民群众对实用价值、情绪价值与知识价值的新需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这些信息,可以看出,以人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共鸣为核心价值的“情绪经济”,已从市场的自发探索,进入国家和地方引导培育新增长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视野。

驱动消费的核心动力 从商品“拥有”转向服务“感受”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关键在于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传统经济模式往往侧重于商品的功能属性,而情绪经济的兴起,深刻反映了当前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变革;驱动消费的核心动力,正日益从对商品本身的“拥有”,转向对服务与体验所带来的“感受”与“共鸣”的追求。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情绪经济的本质,是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消费作为社会生产最终目的的具体化与深化。它通过创造具有情感疗愈、文化沉浸、社交归属等深层价值的新供给,精准对接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特别是对更高层次精神文化、心理认同与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就地而言,需要将培育情绪消费视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和引领新需求的重要切入点。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消费新场景”的部署,在城市重点商圈、历史风貌区及城市更新项目中,系统规划并打造一批承载城市文脉、激发情感互动的高能级体验地标。

情绪经济呼唤“温暖科技” 确立科技向善、技术赋情的明确导向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科技创新,而其根本归宿在于增进人民福祉。我们现在常讲的“包容审慎监管”原则,其深意在于对那些旨在服务人民、但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技术应用提供必要的试错空间,从而保护创新活力。情绪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情感计算、脑机接口、扩展现实(XR)等前沿技术的支撑与赋能。投身情绪经济这场由“心”驱动的消费革命,需要确立“科技向善”和“技术赋情”的明确导向,推动科技创新目标从单一追求生产效率,转向综合提升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心理健康水平。构建“技术—场景—产业”贯通的创新生态,本质上是促进前沿科技与人的情感需求实现深度融合与价值耦合。就湖北来说,需要充分发挥科教人才集聚优势,鼓励高校院所与企业围绕情感感知、智能交互等方向开展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同时,积极引导资本与智力资源投向情感机器人、沉浸式体验设备等“温暖科技”领域,从而将本土雄厚的科技储备,切实转化为能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塑造产业竞争优势的现实生产力。

商贸物流是货畅其流、情达其心的统一 构建情感的“信任枢纽”与体验的“品质枢纽”

现代商贸物流体系的本质,是连接人与货的高效协同网络。情绪消费作为一种以体验和信任为核心的非物质化“商品”,其健康发展尤其需要制度保障来规范品质、维护消费者权益。情绪经济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安全、可靠、敏捷的供应链支撑以及诚信、透明的市场环境。商贸物流向纵深推进,越来越不满足于“货畅其流”,更要追求“情达其心”,将物理上的“流量枢纽”升级为情感上的“信任枢纽”与体验上的“品质枢纽”。要充分发挥湖北在物流方面的综合优势,积极探索建设服务于情感消费品、数字文创产品的设计、快速打样、柔性制造与全球分销一体化供应链平台。这不仅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响应国家“营造有利于新业态发展的市场环境”的内在要求,更是为全国培育情绪经济这一新兴市场,贡献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湖北方案”。

情感超越语言与地域 激活本土资源中蕴含的人类共通情感价值

一个地方的影响力,从本质上讲源于其文化的独特吸引力与由此引发的情感共鸣力。情感可以超越语言与地域,是最具穿透力的交流媒介。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独特的文化标识与打动人心的情感叙事,是形成差异化优势的关键。深入挖掘长江文化、知音文化等湖北本土资源中蕴含的人类共通情感价值,并通过现代化的消费场景与创意产品进行转化,是将湖北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国际交往优势的重要路径。需要精心结合世界级文旅地标,打造一系列富含情感体验的国际性文化节庆、艺术展演与深度旅游项目。推动“风土好物”从特色实物产品,升级为能够讲述地域故事、传递地方温度的文化创意载体。通过这种情感化的叙事与沉浸式体验,使湖北的国际形象与影响力在润物无声的文化交流与情感互动中扎实提升。

情绪经济难以用传统抵押物衡量 金融发展要从服务“物”转向服务“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资源配置的方向直接塑造产业发展的面貌。情绪经济的核心资产是知识产权与创意能力,难以用传统抵押物衡量。强化金融支持,不仅是为其“输血”,更是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建立一套认可并赋能“人的创意”与“情感价值”的新型估值与信用体系。这就要求金融发展必须秉持“资本向善”理念,从服务“物”的扩大再生产,转向服务“人”的创造力再生产。应积极引导区域金融资源,推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融政策在情绪经济赛道上协同发力,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未来收益权融资、信用贷款等适配性金融产品,让金融活水能够精准滴灌,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全国竞争力的本土情感品牌,让金融发展成果惠及更广泛创新创业主体。

推动情绪经济发展,是一场深刻的发展理念革新。需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将满足人民的情感需求与精神追求,置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唯有在“人”与“物”、“情”与“理”、“硬实力”与“软温暖”的辩证统一中稳步前行,才能为现代化征程注入持久而深厚的人文动能,谱写好属于人民、温暖人心的发展新篇章。(作者为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情绪经济是一场由『心』驱动的消费革命